

中国近代化与

ZHONGGUO JINDAIHUA YU
ZHONGGUO ZIBENZHUYI

中国资本主义

——凌耀伦先生论文选集

■ 凌耀伦 著

LING YAO LUN XIAN SHENG LUN WEN XUAN JI



四川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	(1)
帝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化·····	(4)
浅谈近代中国“城市近代化”·····	(15)
论卢作孚的中国现代化经济思想·····	(20)
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及其转化·····	(34)
论李秀成在江浙地区实行的土地政策·····	(43)
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	(50)
论四川自贡井盐业手工工场向机器生产的转变·····	(69)
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	(80)
论抗战时期的自贡盐业生产·····	(91)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经济·····	(106)
略述重庆近代工业的发展·····	(129)
论民生公司的发展·····	(155)
“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卢作孚的经营思想 ·····	(166)
卢作孚的管理思想及其在民生公司中的应用·····	(180)
论“民生精神”·····	(196)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经营管理比较·····	(205)
论卢作孚及其社会经济思想·····	(218)
试论清政府洋务派创办和控制的近代机器工业·····	(237)
论洋务企业的经营思想与管理体制·····	(260)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	(269)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294)
后 记·····	(303)

前 言

凌耀伦教授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四川大学攻读经济史研究生时的导师。

凌老师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五十余年，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在经济史学界颇有影响，曾任全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

凌老师主编或单独撰写出版和发表的专著、教材七部，论文四十余篇，共三百余万字。其中，《中国近代经济史》、《民生公司史》、《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等四项，均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美国王安汉学院汉学研究奖助金。1992年，凌老师获得国务院对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特殊津贴奖证。其主要业绩已分别收入美国、中国香港编辑出版的《世界名人录》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大典》等书。

凌老师理论根底深厚、学识渊博、教书育人、治学严谨、朴实宽容、和蔼开朗，深受师生敬仰。他对经济史学科，特别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颇有建树。这些年来，史学界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近代化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特点的讨论非常热烈，凌老师对此亦有重要贡献。我们搜集了老师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著）共二十余篇，汇集出版。书中有关中国近代化的论述，老师有独到的见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著中，我们选辑的重点不是学术界论述较多并取得共识的地区和领域，如沿海地区、纺织、化工行业等，而是重点选辑了内地或

研究较薄弱的地区和行业，如四川井盐史、大后方经济、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等领域。这些都是老师经过长期调研的成果，具有开拓创新与信史价值，对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特点也具有重要价值或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同时也清晰显示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陈昌智 于建玮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陈昌智：凌耀伦教授于1979年招收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四川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史教研室副教授。在凌耀伦教授的领导下，从事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现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于建玮：凌耀伦教授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四川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史教研室教师。在凌耀伦教授的领导下，从事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现任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

在世界史上，“近代”这一概念总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近代社会经济的产生，又总是以封建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与发展为主要标志的。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尽管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上限年代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深度和广度意见并不一致，但进入 19 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解体阶段，商品经济有了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产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并不是改变了这一总的趋势，而是一方面“促进了这种发展”，即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外资势力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而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特征。正因为这种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特征的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核心，才决定了政治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贯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

为了确切表述这一中心线索，笔者认为，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这一提法为宜。这一提法的含义，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应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旧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科学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其通俗名称）与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分成两个部分，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只有把这两个部分都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才能恰当地把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揭示清楚，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深刻地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只包括民族资本主义，而把中国资本主义

* 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发起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大讨论，本文应召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的观点，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三期。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放在研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历史背景或社会条件的地位，势必容易忽视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何况在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计算产值产量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等许多地方，很难也不宜把两者分开。

另外，也应该见到，旧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和一定的买办性，但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仍然有利害的冲突；它虽然压迫民族资本主义，但仍与民族资本主义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存在一些共性，即它们都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中，有些对民族资本主义也是有利的，如提高关税、裁除厘金、币制改革等等。在产品结构上，技术力量上，国家资本与民族资本又常常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两者的对立和矛盾这一基本方面，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某些共性，就会在论述一些经济现象或历史事件时产生失实和偏颇或者简单化的后果，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发展”。这种认识可以打破“沉沦”观。实际上，以“发展”观来处理和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象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尽管曲折困难，危机四伏，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无论是产值、产量、企业数、资本额，还是扩及的部门与地区等指标都是上升的，“停滞”、“下降”、“破产半破产”等都是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可以说在国统区经济未进入总崩溃以前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在这一“发展”总趋势的观点上去论述“停滞”、“破产”、“下降”，势必给人以每况愈下的凄凉之感，这当然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尽管洋务运动“破产”，但直到1915年前后，其产值、资本与范围规模等仍然不断扩大，经营管理和技术仍在不断进步；只是在北洋军阀统治后期才呈现过“下降”或中断，这主要是政局动乱造成的。四大家族垄断统治时期，国家资本主义不断膨胀更是有目共睹。如果我们只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腐朽”及“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管理上仍在进步，这无疑是片面的，而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吞并民族资本或窃取他人成果而来。事实上，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更多的情况是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同时得到发展，只是它们各自发展的领域、产品和速度不同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于准确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发展“缓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特征。这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城市资本主义与农村资本主义，都有充

分的材料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和中国差不多时间起步的日本和俄国比较，更为明显。中国近代经济史不仅应充分揭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下的现象，更应深刻全面地揭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落后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诸如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主义的束缚、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以及中国自身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管理水平的落后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把这些问题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缓慢这一中心线索联系起来，不仅有助于把握这些问题的重点，而且可使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个清晰的脉络，从而正确而深刻地展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本质，并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的认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认识。



帝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化^{*}

一、近代化的涵义

在世界史上，“近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总是与封建社会的“古代”相对立而与资本主义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就曾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从封建社会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①。因此，近代化应该是从封建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整个过程。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为主要内涵；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成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最终以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在文化思想上则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传播与普及，以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兴起与建立等等。通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经济史的著述，无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形成作为近代社会的标志。所以，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划分近代与古代的界线，一般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或基本确立资产阶级政权为主要标志，如英国 1640—164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 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 1848 年建立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联盟，美国 1783 年独立战争胜利，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日本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俄国 1861 年废除农奴制的资产阶级改革等，无一不是这样。而在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些国家在外国资本侵入以前，都属于封建性质的国家，都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但自外国资本侵入并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后，这些落后的封建国家便很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一般都把这些国家开始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年代作为进入近代社会的上限。在中国，则

^{*} 本文为 1990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鸦片战争 1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本文与西南交大副教授许俐合著，发表于《太平洋文集（4）》之《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转载于《天府新论》1991 年 2 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255 页。

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进入“近代”的起点。但是也应该看到，1840年以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商品经济发展基础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和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增长的阶段，“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所以，在论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时，不能割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发展的历史，而应该把这段历史看做中国近代化过程发生的基础。

二、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产生

首先，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②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与土地使用权的极度分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结构非常牢固，严重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机制产品在特权保护下大量涌进中国，以其“价廉物美”的优势猛烈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迫使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与农业分离，并促进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从而使广大农民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广大农民一旦被卷入市场成为小商品生产者，不仅冲破了封建的狭小的地方市场，也加速了他们自身的分化与破产，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等客观条件。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正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六十年代产生的。甲午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加剧的条件下，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加速进行，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起了“助产婆”的作用。这个过程正如马克思评论印度村社制度解体时所说的那样，是“一次社会革命”，“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英国不管干出多大的罪行，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589、5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589、591页。

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

其次，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相继开设了许多商店、银行，创办了轮船航运业与加工工业，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轮船航运与修造。到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的各种企业资本约达 1.1 亿美元，其中仅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就达 5400 多万美元，为这一时期中国本国资本 2500 多万元（包括清政府创办的民用工业与民族资本工业之和）的 1.54 倍。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已由 1894 年的 5400 多万元增到 12.37 亿元，增长了 22 倍，1920 年又增到 16.67 亿元，1936 年上升到 64.3 亿元。外国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1894 年为 60.1%，1913 年为 80.3%，1920 年为 70.4%，1936 年为 78.4%。^② 外国资本无论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中，还是在金融贸易业中，都居垄断地位，操纵了中国国民经济命脉，成为中国经济的统治力量。这些在华的外国企业，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而且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新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近代化）在中国领土上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孕育出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和技术管理人才，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还产生了中国的买办阶级和买办资本。这些买办商人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又有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资本家。在中国早期的近代工业资本中，买办投资居第一位，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至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所进行的宗教文化活动，虽然具有奴化中国人民的性质，但它在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如自由、平等、资产阶级价值观等，冲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意识，对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三、中国人民发愤图强，主动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途径

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只能反映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一个方面。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实质。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同起来，也不能把中国引进或采用西方机器设备统统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7~68 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114、127、110 页。

结果。

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代，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总是要向封建的落后国家渗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①。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特别是向落后国家渗透，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不管侵略或不侵略都会发生。但是，西方文明“输入”或渗透到落后国家的方式、途径和效果则有很大差别。一般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如战争）占领或控制落后国家，推行殖民地统治政策，以发展宗主国经济为核心，破坏这些国家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强行推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推进这些国家近代化的发展，如在印度、土耳其等许多殖民地国家就是如此；一种是由落后国家自己独立自主地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明（包括设备、技术与管理，以及政治制度与文化思想），结合自己的国情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推进近代化的发展，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和俄国。

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对立。一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另一条是中国人民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式和内容在各个阶段虽有区别，但斗争的实质可以归纳为殖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即是发展扶持民族经济还是排斥打击民族经济。在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尽管有它的两重性，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它一直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与排挤。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每次高涨和发展，无不是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及其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收回路矿权运动、抵制日货、抵制美货、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则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可见，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至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机器设备、技术管理主要来自西方，这也是事实，但来自西方的文明，并不都是侵略。这是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255页。

其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主动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结果，这与帝国主义侵略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获得像日本、俄国那样独立发展的条件，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才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成分，其产业资本在整整四十年时间里（二十世纪初到抗战前期）都居本国资本的第一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和特点。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产业资本仅有722万元，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20%；到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上升到1.55亿元，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51%；1920年又增为4.29亿元，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61%；1936年又上升到13.3亿元，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5%。直到1942年以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统区的产业资本中仍占第一位。如果加上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其资本与产值还要增加一倍以上。^①这是中国人民大众，包括一切爱国志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坚持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成果。

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最早产生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1895年以前，其设备和规模远远超过民族资本。但自甲午战争以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缓慢。国家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额1913年已退居民族资本之后，到1920年仅及民族资本的63%（2.7亿元），到1936年降到33%（4.4亿元）。但是，这一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从产业资本转向银行资本。特别是从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其通俗名称是官僚资本），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商业投机资本和工业资本很薄弱。据统计，国统区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不包括军用工业）资产1935年为2.5亿元，仅占官营和民营资本总额的12%。1941年，这个比例急剧上升到50%（8亿元），1942年，跃居民族资本之上，达到69.5%。^②实际上，官僚资本中的产业资本在全国居于绝对垄断统治地位是在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官僚资本约占全国产业资本的80%，这主要是接收了日本、德国在华资本的结果，而这时，英美等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已经不多。因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419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4~130页。

^②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419页，第四辑第1~2页。

此，这时的官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括了外国在华的资本势力。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本国经济的垄断统治，应该是在 1936 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以后才开始的，其中产业资本的垄断在 1941 年以后才开始形成，直到战后接收了巨额敌伪资产以后才成为全国性的垄断势力。由于官僚资本的设备和技术水平都高于民族资本，并集中于重工业部门，因此，它是代表中国近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经济成分。

旧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殖民地国家的殖民主义经济，也不同于“九·一八”以后我国东北的傀儡经济和抗战期间关内的日伪经济。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取得的。虽然它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具有买办性，并与帝国主义一起排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仍然不像买办经济那样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它和帝国主义势力仍然存在利害冲突，以致在洋务运动中有“稍分详商之利”的主张，在国民政府初期有“关税自主”提高关税税率的措施。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帝国主义企业之间有时也存在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尤为明显，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即令是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创办者，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周学熙，以及国民政府中某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动机，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某些推动作用也是应该承认的。这是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五、不可忽视传统经济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往往被人忽视。在一般情况下，机器大生产必然排挤和淘汰手工生产。但是，在机器大工业产生后的相当时期内，由于商品市场的扩大和机器大生产引起的新的需求的增长，特别是“过剩劳动力”的增加，又为新的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刺激了一批直接或间接为大工业服务的手工工场的产生，马克思称这种工场为“现代工场手工业”，它是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原有的手工业，包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由于受到外国机制产品的冲击而大量破产或衰落，它们多数转向了其他受帝国主义冲击较小或市场发展所需的行业。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后，产生了大量新的手工工场，这些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与当时的机器大生产往往是同步进行的，凡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时期，也是手工工场的兴旺时期。据估计，1920 年中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的产值已达 12.9 亿元，而当时中国的近代工业总产值仅 10.6 亿元。到 1936 年，在国内商品流通价值额中，近代工业品只占 34%，手工业品却占了 43%^①。可见，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 20 世纪已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成分，当然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往往又是相辅相成、互补互存的，如中国机纱的主要市场就是手织工场。1935 年，全国手织布耗纱量占全国棉布耗纱量的 63%^②。抗战时期重庆近代纺织工厂大发展之时，手织工场也大量增加，从 1934 年到 1942 年间，机户增加了 37%，布机增加了 63%，1942 年，手织工场耗纱量已占全市机纱销售量的 81.3%^③，手织工场已成为纺纱厂产品的主要市场。又如四川自贡井盐手工工场的高度发展，促使了机车汲卤工业的产生，而机车汲卤工业产生后，一方面使原有的某些辅助工场（如篾索工场、竹木工场、骨角工场等）趋于衰落，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新的冶铁、机修等新工场的产生^④。在中国，近代工业与手工工场在技术上的联系也不容忽视。不少近代工业都充分利用了传统的手工技术基础。近代缫丝厂的熟练工人就多是原有手工工场的缫丝工人。继昌隆缫丝厂之所以出现于广东南海决非偶然。20 世纪后，不少近代冶铁、采煤、棉纺织等工厂，都是在原有手工工场或新兴手工工场基础上产生的。许多中外近代企业在中国广泛推行的包工制度，也正是以中国的技术工人的广泛存在为前提的。20 世纪后中国大量手工工场的存在，为中外近代工厂较顺利地招到技术工人准备了条件。当时不少近代工厂，如火柴、针织、毛巾、搪瓷、日用化工及农产品加工厂，都是大量使用了传统手工技术或者采用了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只在少数环节上使用了机器。这些情况都反映了中国近代化处于启动阶段的特征。

中国近代工商企业广泛利用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帝国主义企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因此，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依靠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当时，如何利用我国传统文化调动与发挥职工在企业中的能动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已被许多企业所重视，它们纷纷制订了自己独特的厂规厂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这些厂规厂训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255 卷、第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310 页。

③ 根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4 卷，第 152 页资料计算。

④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中国盐业史论丛，第 518 页。

是各企业根据自己企业的性质、服务对象和当时的形势与职工特点制订的，它体现在企业的宗旨和各种规章制度、职工守则、职工培训甚至生活起居中，成为职工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对企业克服各种困难，推动企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作用。如以爱国主义、集团主义、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民生精神”，在民生公司与帝国主义争夺川江航运权的斗争中，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民生公司在险恶的逆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特别是它的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令中外瞩目，对中国航运业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东亚毛纺厂的“东亚铭”与“厂训”，提出了“振兴中华、效忠国家民族、服务社会”等精神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做人原则武装东亚职工，保证了公司信誉，产品畅销国内外，经久不衰。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久（大）永（利）黄（海）工业集团”提出的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为中心的“四大信条”，武装了职工，使公司能以技术革新的成就著称于世，“侯式碱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法，使公司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面旗帜。这些公司为了使企业精神真正深入人心，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和激励职工的具体办法，整个企业精神都贯穿了重视人的因素，发挥了传统文化中“重人轻物”、“重信义，倡勤俭”、“艰苦奋斗”与爱国主义传统。这些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企业经营思想，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六、中国近代化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多渠道进行的。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水平、资本结构、组织与管理方式，各有差异和特色，但从总体上考察，中国近代化的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虽然经过 100 年的历程，但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中国近代化水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可用衡量中国工业化的通用指标，即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主要标尺。1920 年，中国近代工业（包括中外企业及矿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9%，如果把近代交通运输业的总收入计入总产值，也只占 6.4%，如果再加上手工工场产值则可上升到 11.9%。这三项指标在 1936 年分别上升到 10.8%、24.7% 和 27%。1949 年，近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17%，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则可达到 23.1%（交通破坏很大，无确切数字）。总之，中国全部

^① 凌耀伦主编：《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2 页。

资本主义工业（包括外资企业及手工工场）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多不超过 27%，其中最能反映工业化水平的近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产值的比重，最高也不超过 24%。如果以绝对值计，1949 年全国解放时，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 163 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民收入 58 亿元。这就是 100 年近代化积累起来的产业资本。^①

中国近代化的水平和发展速度之低，若与中国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俄国、日本比较，就更为明显。俄国 1861 年废除农奴制时，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 20 万，棉纺织品产值仅 5000 多万卢布。工业生产中主要是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刚刚起步。但到 90 年代，机器生产就在俄国各主要工业生产部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仅棉纺织品产值就达 2 亿多卢布。90 年代以后，俄国的近代化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十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一倍，煤铁增长 2 倍以上，钢增长了 35 倍。到 1913 年，俄国全部近代工矿业总产值已达 61 亿卢布。而中国 1920 年近代工矿业产值仅 10.6 亿元，1936 年也只有 33.1 亿元。1913 年俄国近代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2.1%，而中国 1920 年仅占 4.87%，1936 年仅占 10.8%。中国 1933 年主要工业品产量与俄国 1913 年产量相比较：钢：2.5 万吨：42 万吨，煤：60 万吨：420 万吨，纱锭：459 万枚：767 万枚，发电能力：63 万千瓦：110 万千瓦。^② 比俄国多走了 20 年的中国，竟远远落后于俄国。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只存在一些手工工场，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配称近代工业的只有少数国营军事工厂。日本工业也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起步的。第一个机器纺织厂是 1866 年才设立的，到 1885 年，机纺纱锭仅有 65000 多枚，比我国 1894 年前洋务民用工业纱锭数（13 万余锭）还少。但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日本便进入了创业高潮。1893 年，日本纱锭骤增到 38 万锭（中国全部中外纱厂纱锭到 1906 年才达到此数）。到 1904 年，日本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工厂已达 3700 多家（而中国此时不到 500 家，20 世纪 30 年代才达到三千多家）。1900 年，日本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已达 20.9%，1913 年上升到 49%，这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已达 10334 家，纱锭增到 241 万枚，而此时中国的中外纱锭总数才 82 万余枚。1919 年，日本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又上升到 62%，^③ “成为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俄、日三国的近代工业差不多从二十世纪

① 樊元、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 189~192 页。

②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1419 页，第四辑第 1~2 页。

③ 樊元、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 237、243、266 页，严中平：《中国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4 页。

六七十年代同时起步，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拉开了如此巨大的距离，中国近代化速度之慢已十分明显。

反映中国近代化（或工业化）水平低下、速度缓慢的指标还有许多，如生产资料生产远远小于消费资料生产：在中国 1933 年工业生产总值中，生产资料生产仅占 17%，推动近代化生产的核心部门——机器制造业，产值不到 2000 万元，仅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0.9%。而在西方国家中，机器制造业比较薄弱的俄国，机器制造业产值 1913 年已达 4.2 亿卢布，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6.8%。至于中国工厂的机器设备与动力配备和劳动生产率等，就更为落后了。1947 年对一万余家工厂的调查统计表明，当时中国平均每个工人使用马力仅 1.2 匹，而远在 1910 年时，德国就达到了 3.9 匹，俄国也有 1.5 匹。

七、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在中国的投资设厂，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这只是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影响的一个次要方面。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影响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他们扶持中国封建政权或者建立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共同压迫中国人民，镇压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扼杀和阻止中国独立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保护，只能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不能顺利进行和发展速度远远低于日俄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特权的保护下进行的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尽管这种解体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市场资金的条件，但解体后形成的商品市场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服务的，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服务的，给中国留下的民族市场极为有限。从而，在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大量货币财富落入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腰包，中国自身的货币积累十分困难。在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市场的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持有者也不愿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9、589、591 页。